

**TIME  
LIFE**

WORLD WAR II COLLECTORS EDITION

美国  
时代生活公司  
授权出版

战 俘

〔美〕罗纳德·何·贝利 著  
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王 莘 译

PRISONERS OF WAR



# 图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典藏本

**TIME  
LIFE**

美国时代生活版

WORLD WAR II COLLECTORS EDITION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美国时代生活版·图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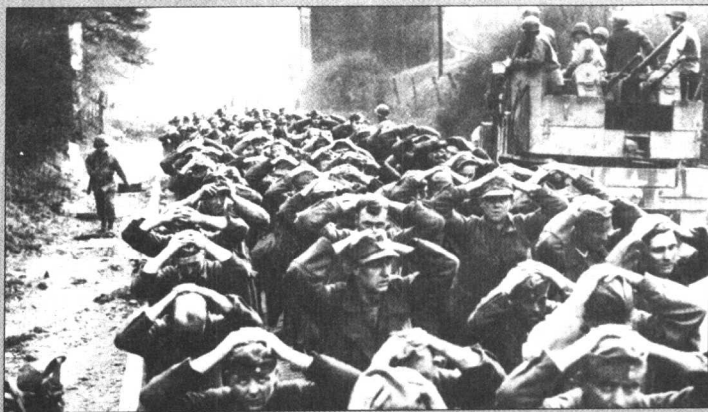
# 战 俘

[美] 罗纳德·何·贝利 著  
及时代生活丛书编辑  
王 苹 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海南出版社



在美军的看押下，一批被俘虏的德国士兵从莱茵河东 20 英里的一支美军高射炮部队旁边走过。其中有 800 人是在 1945 年 3 月被美国第一集团军所俘。同一年还有 50 万德军向美国人投降。



图文第二次世界大战史

战 俘



# 目 录

## 章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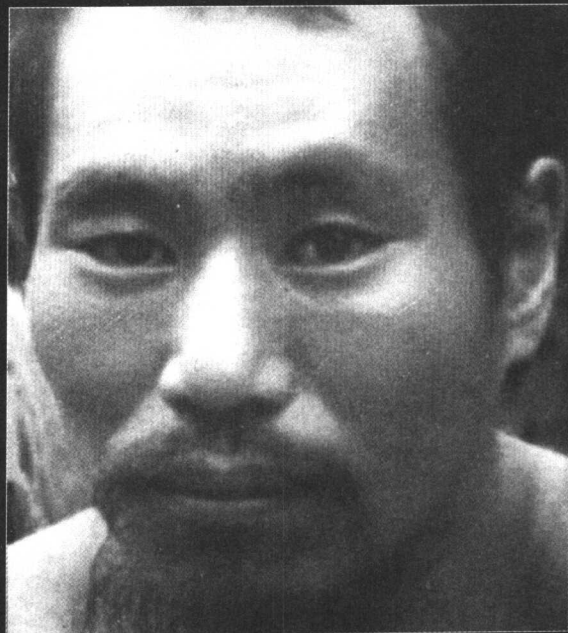
1. 牢狱战争 /8
2. 死亡铁路 /36
3. 逃逸之机 /68
4. 东线的混乱 /112
5. 务实人道 /156
6. 紧张救助 /170

## 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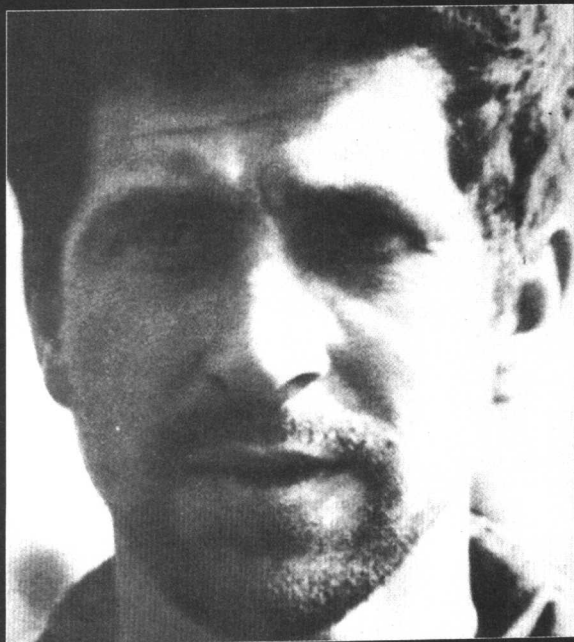
- 囚徒写真 /6
- 远东地区艰苦生活的考验 /26
- 在德国的战俘们 /54
- 打击德国系统 /88
- 艰难旅程 /102
- 囚禁者终被囚 /130
- 悠闲的监禁 /140
- 自由的甜蜜滋味 /184



英联邦, 1940



日本, 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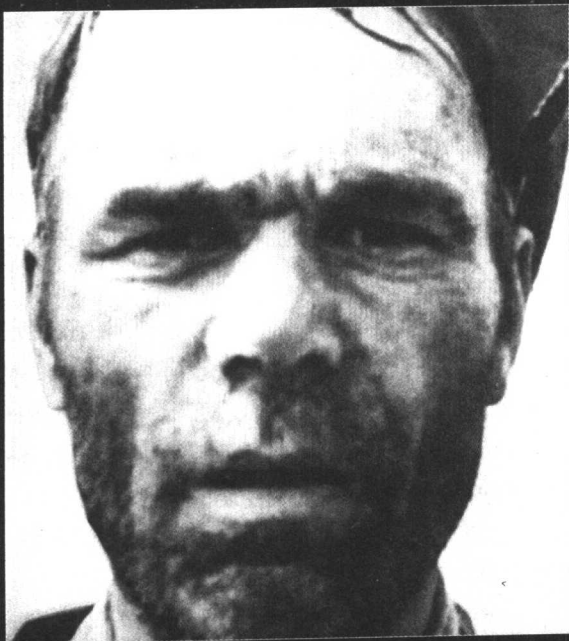


美国, 19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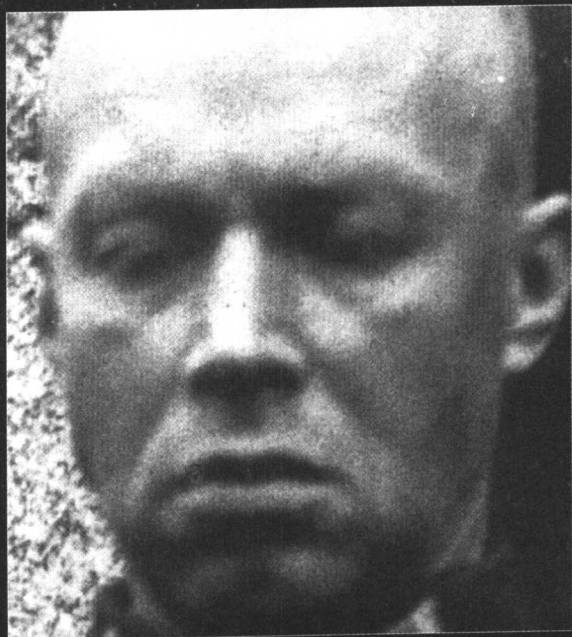


德国, 19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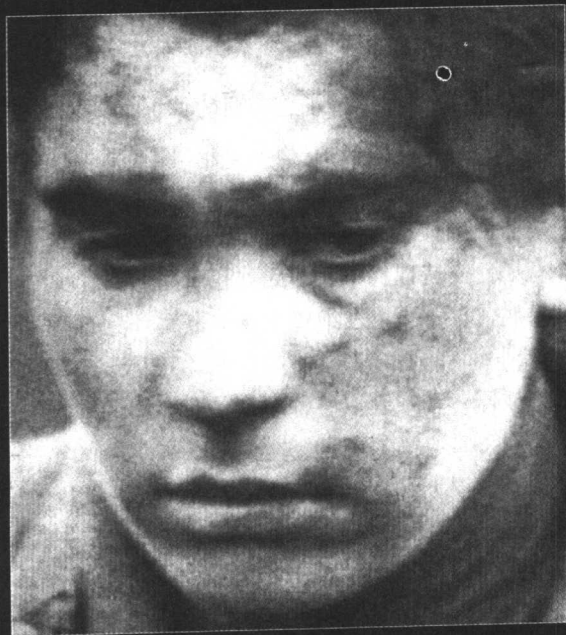
# 囚徒写真



苏联, 1941



德国, 1944



苏联, 1942



意大利, 1943



# 1

## 牢狱战争

一场适者生存战争

日内瓦会议及军火协议

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败

“往死里打”

窗棂后面暗藏的麦克风

为纳粹追随者而设的度假营

“亲爱的约翰”和“美索”

无聊的牢狱生活

假装的癫狂和疾病

坚持到底才是胜利

对年轻的英国牙医军官朱利叶斯·梅·格林上尉而言，战争并非毫无可取之处。1939~1940年冬，德国入侵波兰及欧洲战争爆发后不久，格林就被派往法国第五十一高地师的救护部队。尽管不断逼近的德军带来了紧张和压力，但格林仍不忘在工作之余自我取乐。他写道：“战争对我而言是一个不错的转变，至少我不必像从前那样一周六天站在牙科的治疗椅后面。”

1940年6月12日，格林所在的救护部队在英吉利海峡的圣·维拉里被困。他们还没有来得及从海上撤退，就遭到了德军的三面围攻，五十一高地师当日正式宣布投降。格林当时离开了救护所，独自在圣·维拉里的街道上徘徊并寻找受伤的战友。

“转弯时，我遇上了一辆坦克。舱盖里钻出一个身穿粗棉服的人，他手持自动枪对准我。”

“嘿，听着，对你来说战争结束了！”这个德国人对我嚷道。

二战战场上这句德语被不同的语言重复了：带着美国密尔沃基口音的德语，俄语，日语，还有一种谁都懂得的“语言”——用枪指着肋骨的动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约1500万男战俘和少数的女战俘听到、感受并体验了这句话的真正含义。

对于他们而言，一场战争结束了，然而另外一场战争才刚刚开始。与战场相比，这场铁丝网后的新战争并不更轻松。这是一场适者生存战争。战俘们没有任何支持现代军队的武器和后勤保障，却需要和疾病、饥饿、厌倦及绝望相斗争。而且他们面对的是全副武装的看守者，这些看守者可以肆无忌惮地迫使战俘劳动并套取各种军事信息。“你完全在你敌人的手掌心里打转，”朱利叶斯·格林的同乡——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曾撰文回忆自己的战俘生涯（他在41年前在南非布尔战争中担任战地记者时被俘），“他仁慈，你才能活命；他怜悯，你才有面包。你必须惟命是从，任人摆布，取乐他人，独自忍受。”

“忧郁”是丘吉尔用来形容战俘心情的词语。这

个形容词在20世纪依然通用。自从人类第一次拿起武器对抗时，战败的对手就成了战胜方的俘虏。二战中战俘数目之大、分布之广是史无前例的。囚禁战俘的工具——铁丝网、电网、竹栅栏、路障星罗棋布，从美国和加拿大延伸开去，穿过英国、意大利、德国和苏联，又直入亚洲、澳大利亚、日本以及太平洋岛国。

官方正式名单上的战俘数量达上百万。但是还有大约2000万人由于国籍、种族、宗教或劳力的原因被秘密囚禁。日本在太平洋和亚洲战场上拘留了约75000名来自美国、英国、荷兰及其他盟国的传教士、商人、外交家、农民或殖民地官员。纳粹德国为了保证战争工业的正常运转，从波兰、法国及欧洲占领国关押了约500万的劳工。德国还将约600万的人关进其声名狼藉的集中营并处死，这些无辜的遇难者多为犹太人。

世界上还没有一场战争被俘的几率高过二战。也正是在二战期间才第一次书面规定了战俘的待遇。日内瓦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国际公约来确保战俘的基本待遇。在瑞士的呼吁下，47个国家（包括除苏联外所有的二战参战国）于1929年6月联合签署了与国际红十字协会合作的协议。国际红十字协会始创于瑞士，是为世界撑起的一把巨大的保护伞。该协会在全球100个国家设有分支机构。国际红十字协会的宗旨是解救所有人的苦痛。1859年法国和澳大利亚的战争爆发后，国际红十字协会为保障伤员的安全而开始介入战争。

瑞士人让·亨利·杜南所撰写的伤员苦痛纪实使整个欧洲为之震撼动容。1864年，16个国家的代表聚首瑞士。共有12个国家签署了第一次《日内瓦公约》，在这次公约中首次确定了红十字协会的标识（倒置的瑞士国旗，红底白十字），以及允诺为战争伤员提供诸如选拔战中立医护人员等的人道主义治疗和援助。

出于相同的考虑，一战中瑞士等中立国十分关注战俘基本待遇的保障。他们通过种种途径如参观

战俘营及单独听取战俘的抱怨等等，来确保战俘们的基本人道待遇。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正式认可了此类保护措施，同时又增加了一些其他的指导原则。《公约》正式确认战俘是身着军服的正规军，这个定义就使战俘们不再被视作游击队、间谍及其他非正规军。《公约》还指出战俘在任何时候都享有人道待遇。《公约》详细地列出了战俘的权利及战胜方囚禁战俘应负的责任。战俘的食物、衣服及住宿条件须与战胜方士兵待遇相当。战俘应当可以自由与家人进行交流。只要战俘不是军官，战胜方可以要求战俘为其工作，但条件是该项工作不会有损健康，同时该项工作也不得与战争直接相关。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这些保护措施能否真正被履行还是个未知数：铁丝网后求生的战俘需要面对战胜方难以捉摸的习惯和态度。况且身处战时，他们对《日内瓦公约》中的人道援助条款又能寄予多大的希望呢？即使一个国家承诺遵守《日内瓦公约》，战俘的福利保障实现的关键还是掌控在关押者的手中。美国士兵哈罗德·杰·法罗回忆起他的囚友抱怨工作时间太长后德国守军的反应。那位德国关押者指着自己的步枪说：“这就是我的《日内瓦公约》。”

《日内瓦公约》实践的主要困难是三个主要参战国——日本、苏联及德国——都在不同程度上对《公约》置若罔闻。日本在1929年签署了《日内瓦公约》。1941年12月7日日本在偷袭珍珠港后不久宣布将就《日内瓦公约》作一些必要的改动。然而，日本事实上完全背离了《日内瓦公约》中关于保障战俘待遇的原则规定。苏联自20年代起就与国际组织保持隔离的状态。苏联没有参加日内瓦会议，也没有试图遵守《日内瓦公约》。德国则采用了区别对待的政策。德国在东部战线上对《日内瓦公约》置若罔闻，而在西部战线上则对来自法国、美国及英国的战俘基本上保证了《日内瓦公约》条款中所规定的待遇。

苏联和日本在战俘问题上态度强硬。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是源于两国对士兵地位所持的强烈的政

## 世界军事监狱分布图

二战中1500万名战俘分布的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球性特征。地图上显示战俘营分布在三个大洲：英国、日本的岛屿以及日本的海外占领地。灰色的点标识的是盟国的战俘营。黑色的点标识的是轴心国的战俘营。一个点对应一个战俘营。而在远东地区，一个点则与三个战俘营相对。

日本将其大部分的战俘营设在亚洲大陆及战时占领地，如荷属东印度群岛。德国的主要战俘营则设在德国以及德属波兰的西部。1943年以后德国接管了意大利的战俘营，将意大利设在希腊的

战俘营也收归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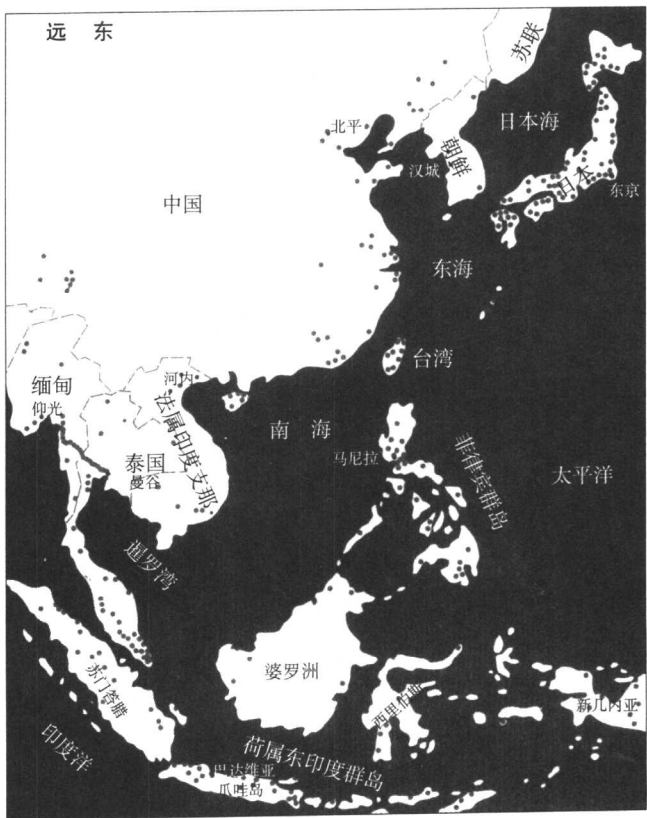
苏联战俘营的分布状况大致与他们所设的监狱分布全球情况相同。苏联后来在苏属东波兰又设立了新的战俘营。下图所显示的只是一小部分战俘营；尽管苏联拥有将近3000个战俘营，但是目前得到确认的只有5%。为了充分挖掘囚犯的劳力资源，美国和加拿大在农业地区设立了许多战俘营。英国的战俘营大多设在英格兰岛，同时在威尔士、苏格兰及北爱尔兰也有分点。随着战争的进程，全球战俘营和囚犯的数目几乎每月更新。



上图显示了1940—1945年，英国、苏联及柏林——罗马轴心国所拥有的战俘营分布图。英国共有86个战俘营，苏联至少有150个，德国拥有90个，意大利则为21个。



1944年6月美国拥有约300个战俘营,1945年增至666个;加拿大则有21个战俘营。



日本本土拥有176个战俘营;在亚洲占领地还有500个。

治和传统态度，而他们将这种态度转嫁到战俘身上。苏联独裁者斯大林号召士兵们战斗至死。斯大林担心落入敌军手中的士兵们可能背离社会主义信仰。日本对待战俘的态度则更多地受其文化传统的影响。他们通常用传统武士道的行为规则来评判一个日本士兵的战场表现。

武士道首先是一种荣誉和耻辱的代码。美国人类学家卢斯·本尼迪克特在她战后研究的一本书《菊花和剑》中这样描述日本文化，“荣誉往往意味着战斗至死。在绝境中，一个士兵应该用最后一个手榴弹自杀；如果没有武器，那么士兵应该徒手进行自杀式的攻击。但是无论如何，日本士兵绝对不能投降”。

投降意味着耻辱——这种武士道的观念深深地植根在日本士兵的心中。太平洋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盟国只俘虏了几千名日本士兵，而这些战俘大多是在重伤无法动弹的情形下被抓的。1944年缅甸一役中，共有142名日本士兵被俘，而战死的日本士兵人数达到17166，两者的比例为1:120。而与此相对，西方军队的指挥官所预测的战俘与牺牲士兵的比例则只有1:4。

日本陆军中尉小野田宽郎的事例可以说是日本人对投降以及战俘态度的典型代表。小野田在接受过手榴弹技术训练之后于二战的最后一年——1945年登陆菲律宾北部参加战斗，他的任务是协助小岛上疲惫不堪的守军共同守卫飞机跑道，使之不被美军夺走。美军最终占领了飞机跑道，绝大多数日本士兵不是被俘，就是被杀，而小野田遵从日本军方坚守待援的命令，独自在小岛的丛林中坚持战斗。

战争结束后，小野田还是拒绝投降。空投入丛林的宣布日本投降的传单、报纸、杂志、扩音喇叭中他哥哥的呼唤，都被小野田视作敌人的诡计。他在远离陆地的小岛上坚持了30年，反复阅读《日本军队守则》来坚定自己的意志。

1975年一个年轻的日本人铃木德男偶然在丛林

中遇到了小野田并试图劝服他离开丛林。考虑到小野田会比较孤单，他就在老兵的隐匿处附近支了一个帐篷，等候这位老兵出现并和他交谈。最终他还是使老兵相信战争确实已经结束了。铃木还引用自身携带的《日本士兵守则》中的条例来证明：放弃是符合日本的军事传统的。小野田同意投降，但是条件是收到指挥官的命令。于是已经改行做书商的指挥官特地来到丛林为他宣读了1945年日本天皇所颁布的正式投降书。

由于日本对西方采取毫不妥协的态度，日本人痛恨投降的理念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待其他国家战俘的待遇。日本人认为俘虏应该受人蔑视。战俘的懦夫行为理应受饥饿、苦力及体罚的待遇。因此，日本关



押的95000名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的战俘中有超过28%的人在战俘营丧生。与此相对，在德国的26万名英国和美国战俘中只有4%死亡。

而苏联则遵从斯大林所定的战俘待遇规定。他们对德国人一贯持仇恨态度，并认为战俘是没有人权的。德国人在苏联战俘营的生存几率略微高过50%。而就德国方面而言，纳粹的民族主义理念将苏联人及其他的斯拉夫人视作动物，这也就使得苏联战俘注定要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不论囚禁者采取何种战俘政策，战俘自身对待被俘的态度也迥各异。除了日本人之外，大多数的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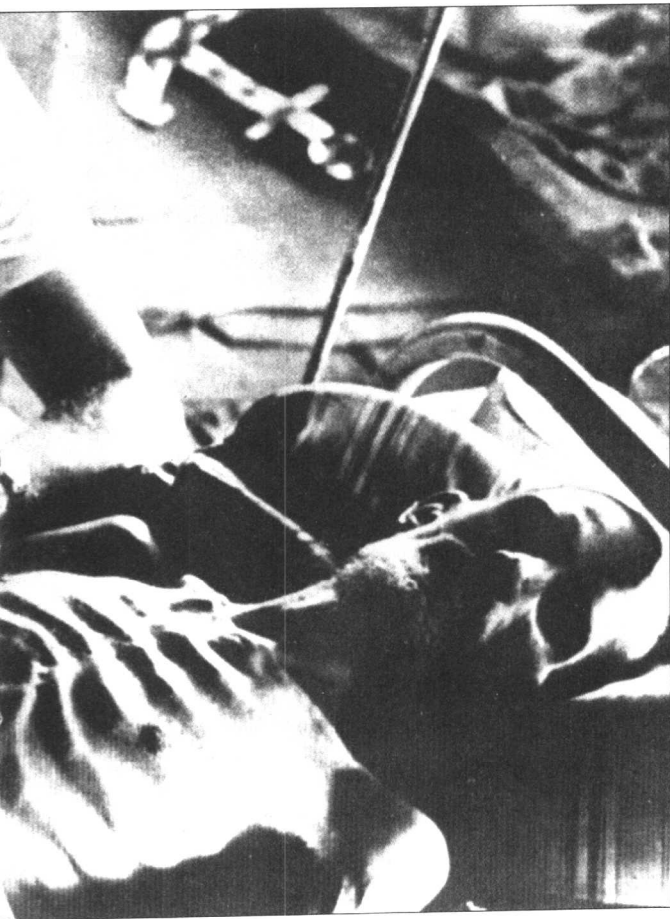
兵并不认为投降是耻辱或是不光彩的标识。现代战争的高度机械化就决定了大量的士兵将成为战俘。对于这些战俘而言，他们的感觉不是耻辱，而可能是震惊、不确定、远离死亡威胁的解脱或是对囚禁者的愤慨。

德国军士莱因霍尔德·培拜尔于1943年在意大利被美军俘虏，当时胸部受了重伤，他回忆了“初尝被俘的痛苦滋味”。他被送往一个战俘营，担架才一着地，一群索要纪念章的人就蜂拥而上，将他上衣上的荣誉勋章强抢而去。等到他们满意之后，他们还问培拜尔有何意见。培拜尔则对此一言不发。

一个士兵最为难熬的时刻往往是初为俘虏的几个小时。空军们被击落在敌军领地时往往面对的是敌意。地面的人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要教训一下在空中向他们袭击的人。由于德国在战争后期遭到了盟军猛烈的空中袭击，德国的人民对盟军空军有着极深的仇恨感，往往对被击落的空军士兵施以私刑。

1944年8月26日当美军空军导弹纵队的八名士兵被击落在德国北部的汉诺威时，他们遭到了近乎野蛮的攻击。在两名德国士兵的押送之下，这些空军士兵登上了列车，前往法兰克福附近的战俘营。由于铁轨被炸弹炸毁，火车在行驶至路索舍小镇的郊区时不得不临时停车。这两名德国士兵不得不步行押送着八名俘虏穿过街道，到小镇的另一边坐另一班列车。

突然一个德国平民和两名妇女冲了上来，口中大声呼喊：“打死他们！”失去理智的农民们拿起石块、棍棒、铁铲、铁锤及砖瓦向这些美国士兵砸去。就



1943年6月用家庭照相机拍摄的这张照片用X光显示一位战俘医师在菲律宾群岛甲万那端的一个日军战俘营里治疗一位奄奄一息的美军士兵。在那里的一万多名战俘中，大部分都染上了多种疾病，包括痢疾、脚气、疟疾、坏血病和糙皮病——所有这些病如果不是因为饥饿造成的话，也因为饥饿而更加恶化。1/4的战俘在被关起来之后的头八个月里就死了。

在这些美国士兵们步履维艰地前进时，当地的纳粹军官约瑟夫·哈根也加入了袭击。在近两个小时的鞭打之后，这群美国士兵终于抵达火车附近。然而此时哈根拔出手枪，对这些美国士兵们一阵扫射。有人从附近的农场借了一辆手推车，将这些美国士兵的躯体拉到镇上的墓地，准备第二天掩埋。

他们中的6个士兵最终被埋在了墓地。而剩下的两个美国士兵虽然受了重伤，但还是趁着夜色成功地逃了出来。躲藏数日之后，他们被德国巡逻队发现并被送往战俘营。为了不让其他受害者的家属知道惨剧，两人发誓绝口不提这件事。他们最终在战后美国特别法庭主持的公开审判会上作为受害人将事实公诸于众，法庭最终判决包括约瑟夫·哈根在内的一些凶徒死刑。

没有人能确切地说出究竟多少俘虏在投降后的几小时或几天里遭遇类似的待遇。根据德国军官的证词，他们至少杀害了47.3万个投降的苏联战俘。其中许多人在投降后不久就惨遭杀戮。战后一些草率处决盟军战俘的日本和德国人受到了审判和惩罚。但是战胜方在战场上所犯的恶行却没有被公开，也没有受到惩罚。

大多数的战俘在投降后都要经历一段旅程：徒步，乘坐卡车、火车或是轮船。战俘们通常先待在战场或是投降地附近所设的临时集中地，随后再转移到固定的战俘营，而这些战俘营通常都设在囚禁者本土。

战俘们在前往固定战俘营的旅程上所遇到的情形各不相同。北非、意大利以及西欧抓获的德国战俘通常被送往美国的战俘营，在这段旅程上不太拥挤，许多战俘们可以在船舱里睡觉。而太平洋及东南亚的美国、荷兰、英国及其他盟国战俘则被塞入拥挤憋闷的货舱前往日本。美军飞行中尉约翰·费·基尼回忆起，当英勇的维克岛守军被俘后，在船上被迫接受日本海员夹笞刑的情形，在那时日本海员可以肆无忌惮地用枪托、棍棒和剑鞘来揍这些俘虏。日本这些

运送战俘的船只很少悬挂红十字标志。因此，许多战俘死在了盟军飞机或潜水艇的攻击之下。

这条通向固定战俘营的旅程更因为战俘们的衰弱和囚禁方的强势地位而更为变幻莫测。新的俘虏们本已饥肠辘辘、疾病缠身，一旦他们的囚禁者们没有运送或养活大量战俘的准备，战俘们在饥饿之余病情也可能加重。

1942年4月9日投降之后，巴丹半岛美国和菲律宾守军经历的旅程异常艰辛。类似的旅程被称为“死亡行军”。由于缺乏交通工具，日本军方就强迫78000名战俘从巴丹半岛步行65英里到欧丹拿战俘营。大约有650名美国人和5000的菲律宾人死在这段旅程中。许多人死在日本军官的棍棒、刺刀以及子弹之下。按照幸存的美国医生的话来说，最终抵达目的地的人也是靠“骨子里最后一丝力量”坚持到底的。

在欧洲的东部前线，类似的旅程则更为艰险。在那儿，无论德国还是苏联都是用火车将战俘从战场运至战俘营的。战俘们被塞入火车，缺少食药，冬季没有任何取暖设备。当一辆载满苏联西部战俘的火车抵达伏尔加河畔的德国战俘营时，车里有700具已经冻僵了的尸体，这些人死于斑疹伤寒症、痢疾及严寒。而往另外一个方向苏联开往德国境内战俘营的列车上，许多人选择了中途跳车，据说他们宁愿在野外独自死去也不愿意在充满恐惧和恶臭的车里死去。但是成功跳车的人数也非常少。

这段旅程尽管充满艰辛，但是还是为战俘们提供了逃脱和重获自由的绝佳机会。战争期间，在该旅程中躲开守卫重返故乡的皇家空军战俘人数比从战俘营中成功越狱的英国空军战俘人数高出3倍。

对许多战俘而言，前往战俘营的旅程还不时穿插着囚禁者的高强度审讯。新战俘往往是信息的最佳来源。在投降之后，他们通常要接受审讯，询问有关部队实力及分布的军事情报。他们还常常被搜身，寻找地图、家书、日记以及任何可能提供线索的文字资料。如果被俘的是空军，那么他身上不起眼的小东

## 在死亡中重获尊严

1944年8月的一个月夜，凌晨两点左右，澳大利亚考拉的一个战俘营响起了号角。几秒钟内，1000多名日本战俘涌向铁丝网，口中高声呼喊着他们传统的战斗口号：“万岁！”他们挥舞着棒球拍、餐刀及其他粗糙的武器。战俘们遭到了澳大利亚卫兵的子弹攻势，但是子弹也不能阻挡他们的决心。激愤无比的战俘们冲向铁丝网，他们踩着战友的尸体向前，但是不久后自己也中弹倒地。

这场起义中共有231名囚犯死亡，另有107名受伤。大约有334名囚犯成功地逃离战俘营。但是他们的东方脸孔常常使他们在数日内就被杀或是被抓回战俘营。

这些日本士兵的领袖们领导这场暴动有其目的：占领战俘营，然后用得到的武器转而进攻附近的一个步兵训练营。但是大部分人包括这次暴动的领袖都认为事实上这次计划无异于自杀。在他们的计划书中，一个拥护者承认了这一点，他强调：“这是一次通向死亡的机会。”

这才是战俘们的真正目的：只有通过死亡，他们才能完成武士道所定的职责。在武士道中，投降就意味着耻辱。日本士兵们被俘的事实使他们深感耻辱，他们一直思量如何通过死亡来重获尊严。

所有的日本人都加入了这次行动。在行动前的几小时内，这些人都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写诗、剪下头发准备带给家人和与朋友们告别。而那些胆小的日本士兵在暴动前就自杀了。

暴动之后，幸存者们都郁郁寡欢。一个幸存者在表达期待下一次死亡机会时这样说道：“我们会展现武士道精神的真正意义所在：我们是日本人。”



澳大利亚战俘营的一位日本战俘在厨房中上吊自尽



西,如一张电影票的票根,都有可能透露其空军基地的所在地。《日内瓦公约》默许类似的搜查和审讯,但是规定战俘在回答时可以只透露姓名、军衔及编码。

一些战俘——尤其是空军、潜水艇队员及高级将领在被押往战俘营之前通常先被带往特别审讯中心。在那儿,受过特训的审讯官们会试图从他们口中得到敌方武器装备、军队编制、经济实力及精神状态等情报。

在试图获得情报的过程中,审讯者会采用从心理战到施酷刑等各种方法。每个大国都可能在不同时期动用过刑罚。日本人在审讯战俘时的残暴程度尤为突出。日本在横滨附近有一个专门审讯盟军潜水员的审讯中心。由于那儿所运用的逼供方式极其残忍——拳打脚踢、刺刀上阵、竹签穿指。因此许多美国和英国的战俘称之为苦痛农场。但是肉体上的折磨很少奏效。尽管急切的日军用尽所有方法探寻美国潜水艇最大潜水水深的情报,但是他们还是未能如愿。这类情报还是成为二战时保守得最好的秘密。

比较之下,英国人从战争伊始所采用的审讯方式可能是更为复杂但同时也是更为有效的。来自德国的战俘们在抵达英国后会被送往被称为牢笼的9所中心的一所。他们首先要接受英国情报员的审讯,而这些情报员通常是操一口标准德语的德国犹太难民。这些情报员轻易就可以获得诸如被俘者的家乡、入伍前的职业等信息。情报员随后会根据这些信息挑选出他们有可能持有重要情报的战俘接受进一步的审讯,而该比例大约维持在1/10左右。

英国的审讯官们依靠这种方式来获取情报,一位英国审讯所的所长形容它为“获取情报的无痛苦过程。”审讯官们大多在战前到过德国学习或经商,他们对纳粹德国极其了解。在审讯室他们往往先花大量的时间与战俘就一般话题进行友好的交谈,然后再有技巧地套取军事情报。为了鼓励战俘开口说

话,伦敦附近维尔逊公园审讯中心的官员会陪着战俘在附近的树林里散步。审讯官有可能指着掠过的飞机开始话题,然后在战俘没有察觉的情形下获取有关德国空军的技术细节。为了防止战俘逃跑,英国方面有专门的安全系统:树都是用电线连接通往传令室。审讯官会不时地通过按安装在树上的按钮来告知他的确切方位。

有时英国也会在房间里设置麦克风来偷听两个德国战俘的对话并借此获得有用的情报。有时德国飞行员轻易地在通风机上发现了一个麦克风;但是当他和他的战友倚在窗棂外谈话时,他才意识到在窗棂上还安装了一个麦克风。而更多的时候,战俘的室友根本不是德国人,而是伪装成邻居的英国军官。

许多英国审讯官获取情报的方式和细节被封存在绝密文件之中。但是目前所确定的事实是两个被俘的德国将军泄漏了一个绝密情报:波罗的海匹纳蒙德导弹试验中心正在安装V-2号火箭。而正是在这个讯息及相关火箭计划情报的基础上直接引发了1943年4月17日轰炸匹纳蒙德导弹试验中心的决定。

英军的审讯方式给一名德国战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年轻的弗朗茨·威拉是王牌飞行员,他在1940年被英军俘虏。在审讯中他惊奇地发现他的审讯官了解他所有的一切,甚至知道他有一只宠物狮子(审讯官在德国杂志上见过他与狮子的合影),在审讯和禁闭之后,他被送上去加拿大的轮船。1941年1月他成功地从火车上逃逸成功。他穿越边界来到了当时还未卷入战争的美国。在德国外交家的帮助下,他最终重返故乡。在德国,他成功地说服空军长官在英军沿线设立德国空军的审讯中心。

德国空军审讯中心设在距法兰克福西北几英里处。在这附近就是被俘英美空军前往战俘营的中转站。在威拉成功说服空军将领之后,盟国的空军们就要应对奥伯豪森审讯营的审问。奥伯豪森审讯营不断地发展,到1944年已经拥有300名工作人员,每月可容纳2000名空军。